

百人百部



雲南文庫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生存与解放

——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

李 兵/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生存与解放
——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

李 兵/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存与解放: 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 / 李兵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1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ISBN 978-7-222-08352-3

I. ①生… II. ①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0406号

责任编辑: 王 梅

美术编辑: 王睿韬 刘 雨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生存与解放 ——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
作 者	李 兵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650091)
电 话	0871-4113185 0871-5031071 5033244
网 址	www.ynpph.com.cn http://www.ynup.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market@ynup.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352-3
定 价	45.00 元

作者小传

李兵，男，1963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教授，哲学博士。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获哲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政治学理论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就职于青海省劳动人事厅、重庆渝州大学（现重庆工商大学）。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中国民族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云南省高校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第七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2007年获“云南省高校教学科研带头人”称号，2009年被评为云南大学首届教学名师，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教学名师。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基础理论、西方人文哲学、民族文化哲学、行政伦理等。主持或参与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或重大项目在内的各类科研课题多项，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生存与解放——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生存与超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哲学考察》等个人专著多部；在《光明日报》、《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学习与探索》、《吉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社会主义研究》、《长白学刊》、《红旗文稿》等学术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云南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编辑出版《云南文库》是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是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是树立云南文化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共性，还有很强的地域性。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一方有一方之学术。学术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云南虽地处边疆，仍不乏丰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尤其明清以来，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臻密切，省外名宿大儒进入云南的代不乏人，而云南的文人学士也多有游宦中原者。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云南的文化学术遂结出累累硕果，文化名人辈出，如杨慎、李贽、李元阳、师范、王崧、方玉润、许印芳等，其总体集中性的代表成果是《滇系》和《云南备征志》。至清末，云南学子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成为云南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改造社会和推进云南文化学术发展的中坚。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云南的学术成果并未为内地所认知。更有甚者，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在全国征集历代遗书，云南巡抚李右江得到云南先贤的著述，但害怕其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内容，竟私藏起来不上报，使得《四库全书》仅从它处收录了3种云南人著述，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辛亥革命后，云南学人痛感地方文化学术之不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由云龙、周钟岳、李根源、方树梅、秦光玉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云南学者倾力收集整理云南文献，于1914年至1923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064卷，及不分卷者47册；1923年至1940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二编，共69种133卷。另编定31种待刻，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云南丛书》的编辑刻印工作中止。历时26年编刻的《云南丛书》把保存下来的历代云南重要地方文献网罗殆尽，是云南有史以来地方文化的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对云南的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术创新的根基是学术积淀和传承。从编辑刻印《云南丛书》之时

算起至今，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云南的学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为云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今天，文化建设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整理和出版云南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是继承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我们才看得更远，走得更实。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云南文库》的初衷。

比之编刻《云南丛书》的时代，云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不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疆省份，而是成为了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云南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发展了，学者力量的壮大、学术成果的丰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云南文库》不可能像当年《云南丛书》一样收录所有的文献资料，只可能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尽可能地把最能体现云南学术文化水平和云南学术特色的成果收录进来，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和传承文化，弘扬学术，促进今日云南文化学术的建设与繁荣之目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云南文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云南文库·学术大家文丛》，收录云南学术大家的作品。

二是《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出生的云南学术名家的作品。

三是《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的优秀作品。

我们将使《云南文库》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不断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云南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云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1年6月

目录

第一章 导言：“解放论转向”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 1

第一节 实践论转向及其局限 2

第二节 生存论转向及其缺憾 8

第三节 解放论转向：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 22

第二章 解放的诉求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演进及价值理想 34

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解放话语”的双重遮蔽 35

第二节 敞开马克思哲学解放的维度 41

第三节 关于人的解放的哲学 64

第三章 解放生存论

——马克思存在论的解放意蕴 67

第一节 西方学者对现代性和现代性生存方式的诊断 69

一、关于现代性的本质 70

二、关于现代性的特征 72

三、关于现代性生存方式 76



第二节 马克思对现代性生存方式本质的揭示	83
第三节 马克思的生存论是解放生存论	98

第四章 解放辩证法

——马克思辩证法的解放旨趣	113
第一节 确立解放论范式的辩证法	114
第二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120
第三节 解放辩证法的基本内涵及其意义	130

第五章 解放历史观

——马克思历史观的解放功能	139
第一节 重新“定位”历史唯物主义	140
第二节 超越思辨历史观	148
一、作为世界观的历史观	149
二、对思辨历史观的批判	157
三、面向现实生活的历史观	161
第三节 解放历史观的基本内涵及当代价值	166
一、意识形态的颠覆	166
二、生存方式的超越	170
三、解放道路的探索	175

主要参考文献	185
--------------	-----

附 录

1 哲学追问是如何可能的？ ——与周国平先生商榷	190
2 哲学观变革与超越哲学基本问题	198
3 人的解放：哲学的真实使命	209



4	“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 ——马克思“消灭哲学”的真实意蕴	219
5	在历史的生成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29
6	试论道德的人学基础	240
后 记		252



第一章 导言：“解放论转向”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

近2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两个重要的阶段，完成了两次重大的“转向”，即：20世纪80年代，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素朴实在论的理解向以张扬人的主体性、凸显人的主体地位为主要特征和理论内涵的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向；90年代以后，从基本局限于近代认识论范式的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关注人的现实生存活动并以此作为解释原则的生存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向，这两次转向被理论界分别概括为“实践论转向”和“生存论转向”。不可否认，这两次转向都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层次，都堪称理论研究“逻辑层次的跃迁”。前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片面强调客体性原则的前康德的“实体”唯物主义解读模式，提升到了自觉地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加以反思的近代哲学的水平；后者则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近代哲学的“知识论”范式向后黑格尔哲学的“生存论”范式的转化。然而，无论是实践论转向，还是生存论转向，都没有真正体现和反映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即使将两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生存论的实践论”或者“实践论的生存论”，也只不过就像此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的结合一样，不仅丝毫没有触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反而造成了对马克思哲学本质更深的遮蔽（因为，如果让人们直接接触马克思充满革命激情和解放话语的哲学文本，兴许还能获得更多的马克思的思想实质）。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类自身解放的学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就是要把“解释世界”的哲学改造为“改变世界”的哲学，也就是要把内在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自在的否定、批判和超越的力量，通过理



论的方式（“批判的武器”）使其转化为自为的力量，进而在人的生存活动中达到自在自为的统一（“武器的批判”），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变革。具体言之，马克思哲学就是要变革“本质颠倒”的人的现代性存在方式，亦即资本主义生存方式，把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在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哲学绝不是专注于“世界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人何以可能”的“知识论”哲学，也不是热衷于抽象地议论“存在的遗忘”的生存论哲学，而是以人的解放为理论旨趣，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非人的生存状况为理论进路，以探索变革人的生存方式的现实道路为理论内涵的“解放何以可能”的解放论哲学。“他想要帮助工人阶级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制，去了解自身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从而支援和指导它的斗争。”^① 因此，我认为，为了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找到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人的生存方式的结合点，真正敞开和实现马克思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当代价值，克服马克思哲学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消除马克思哲学理论工作者的看似“自我放逐”实则逃避现实的倾向，摆脱西方学院派哲学不断翻新的话语纠缠和话语霸权，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复兴，就应当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合理地理解为“解放论转向”。

第一节 实践论转向及其局限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素朴实在论的理解，是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且至今仍统治着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传播者头脑的一种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滥觞于前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盛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东方世界”。由于其深厚而复杂的政治背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该体系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准经典”的地位，甚至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反注“教科书”的情形。这种解读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素朴性和经验性，它和人们的经验常识保持了最亲密的联系，因

^①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9 页。

而受到人们习以为常的“自然态度”思维方式的有力支持，获得了十分坚固的“生活基础”和“思想根基”。素朴实在论理解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拟科学”的哲学。这种哲学虽然强调了哲学与科学的本质区别，但却把哲学理解为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将哲学把握为提供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普适性知识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科学，本质上仍然是“科学之科学”。它一方面以实体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强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客观性（物质性）作出非反思的、自然主义的承诺，又以素朴反映论的方式获取“客观真理”占有者的地位，再以知性化的辩证法作为必要补充，构建了一个典型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转向某种可以通过物质来理解各种哲学论点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或形而上学”^①；另一方面，它又给人许多“知识的幻想”，提供给人们一些“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或者“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即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②。同时，它还助长了“学科帝国主义”的野心，干预和阻碍了具体科学的发展。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看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抬高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崇高的位置”，实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到了近代以前建立在经验直观基础上的哲学的水平。因而，它注定要失去在人们心中的威信，甚至成为人们嘲笑和轻视哲学的话柄。关于这种解读模式的弊端，学界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反思和批判，鉴于它已成为“退入背景”的东西，这里不再赘述。

从20世纪80年初开始，哲学界启动了反思传统教科书的思想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就是把实践的概念全面地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从“物质本体论”向“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即所谓的“实践论转向”。这个转向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从历史背景上讲，它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在理论上的必然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证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的精神要求与生存意向，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其现实性上，都具有深层的合法性”^③。从理论渊源

①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45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③ 贺来：《对辩证法三种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

上讲，则与两部“手稿”式的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密切相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两部‘手稿’式的著作之所以在80年代初的中国理论界（后者主要是在哲学界）引起普遍关注，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或重要命题之所以成为当时的理论研究的某种出发点，不仅在于这是理论界在‘文革’后所面对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资源’直接地影响到‘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中国理论界，这就是以卢卡奇、葛兰西以及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凯德洛夫、柯普宁和伊里图科夫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的‘认识论学派’。”^①

深入研究这一转向会发现实际上又包含着两个阶段或环节：一是“认识论转向”；二是“实践论转向”。这里的“认识论转向”不完全是西方哲学近代意义上的转型，尽管二者存在内在的关联。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是在重新理解和讨论列宁的“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一重要命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深刻地看到：“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对这个论断特别强调指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② 列宁这一重要命题或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模式存在的根本缺陷，那就是在总体上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应当达到的原则高度，甚至还停留在未完成“认识论转向”的前近代哲学的水平上。正像孙正聿教授在《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中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事件”，并没有像在同一时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但它却真实地提升和推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层次。针对斯大林教科书撇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直接去阐述全部哲学问题所存在的根本性的理论缺陷，“并以西方近代哲学已经实现的‘认识论转向’和苏联‘认识论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为主

^① 参见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载《思想中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②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页。

要理论背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界便合乎逻辑地形成了以‘认识论’模式构成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完成的这一“认识论转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一，它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推进到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水平，超越了素朴实在论，克服了“自然主义范式”的直观性和素朴性，达到或者基本达到了从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入手去理解和把握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人与世界的关系；其二，它对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化、教条化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找到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划界标准，一定程度地恢复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本性；其三，由于认识论哲学本身固有的主体性哲学的性质，它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使人以主体的“身份”在“见物不见人”甚至“敌视人”的旧“哲学话语”中获得了被抽象承认的地位，这对历来视“主体性”、“主观性”为洪水猛兽的中国哲学界乃至中国国民来说，具有一定的解放思想的作用。

然而，“认识论转向”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在主客二分、思存对峙的理论前提下，主体和客体的和解、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即“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它只能在两极对立中寻求单极的统一，要么固执于单纯的、自在的客体性原则，从而取消人的能动性；要么偏执于单纯的、自为的主体性原则，从而抽象地发展人的能动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就指出了作为近代哲学两大基本派别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固有的局限性。其二，既然纳入了“认识论范式”，就无法摆脱和克服近代哲学的重大难题——“主体中心困境”。发轫于笛卡尔的近代哲学，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①，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我思”，以非物质的思维主体的自明性和不可怀疑性，确立了精神主体在哲学中的基础和核心的地位。但是它也把作为主体的人禁锢在了它的内在“范围”之中，导致康德所言的“人类理性的耻辱”和胡塞尔所称的“认识超越的不可理解性”，即根本无法解决“思想的客观性”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5 页。

问题。它面临着海德格尔所指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难题：“这个正在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而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认识究竟如何能从这个‘内在范围’‘出去’，如何获得超越？”^①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用“认识论范式”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也只是达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概念辩证法”的水平，而现代哲学恰恰是一种“后黑格尔哲学”（Philosophy after Hegel）^②。这就是说，还没有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提升到现代哲学的水平。

有鉴于此，理论界进一步深化了对“实践”的理解，尤其是加强了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重要文献的研究。在这一理论进军中，完成了把“实践”当作“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向把“实践”当作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原则的转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论转向”。其标志是，在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成为了主流话语。

“实践论转向”的重大理论意义，孙正聿教授在《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一文中，借用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四大部分”的划分方式，作了全面的总结：“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这里主要针对本文所说的‘认识论转向’这个环节。下同。——引者注）强调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从而变革了教科书的那种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的‘世界观理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主体’出发去理解主体对客体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突出了主体在认识运动中的‘选择’、‘反思’、‘建构’的作用，使‘能动的反映论’获得了真实的‘能动性’；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实践——出发去揭示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仅突出了辩证法的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性本质，而且在‘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意义上丰富了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实现了辩证法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统一；在历史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历史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第75页。

② 参见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改变那种把‘历史规律’视为超然于人的历史活动之外的东西的看法，并力图以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去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实现以实践为基础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统一。”^①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哲学的自我理解”的不断深化，一些学者在充分吸取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成果以后，反观“实践论转向”的理论进路和性质，逐步发现了这一转向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它与前一个转向，即“认识论转向”具有理论进程的同步性和理论逻辑的关联性，因而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嵌入到近代认识论哲学范式中去加以把握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虽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仍然可以在表面上或口头上被承认，甚至可以相当夸张地加以承认，但这种承认在哲学上却根本不可能是真正深入的和内在巩固的；同样，在这种情形下，虽说马克思哲学对现代社会之本质的经典批判也仍然可以由某种方式被道说和发挥，但这样的道说和发挥却不能不是缺失原则高度的，并因而是终归于混淆妥协的”^②，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提供了口实。其次，由于对“实践”的生存论本源意义缺乏认识，一方面存在把“实践”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把实践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甚至把“实践”当作“实干”的代名词，使好不容易从“自然主义范式”中拯救出来的“实践”，又有回到经验常识中去的危险；另一方面还存在把“实践”加以知性实体化的倾向，仿佛只要将原来教科书中凡用“物质”、“精神”的地方替换成“实践”，就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范式的跃迁。再次，到底如何“定位”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同“实践唯物主义”，有人反对这种提法；有人要把“实践”本体论化，有人主张“实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意义，如此等等，这本身说明“实践”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还是晦暗不明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在用“实践”消解了传统抽象的实体本体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存在论基础”？若有，这种“存在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

① 参见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载《思想中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② 吴晓明：《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为,“对传统抽象实体本体论的批判,并不必然意味着抛弃本体论本身,并不表明本体论本身的无效,全面考察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现代哲学对本体论正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重视。”^① 还有学者认为,“由于人们的观念形态普遍局限于近代性视阈,或者说把马克思哲学置于近代哲学的框架中给予理解和解释,所以,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变得蔽而不明,这一基础领域所曾经历的最深刻革命之意义也就显得极其有限了。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似乎被分解为各种‘因素’,并依这些因素之不同的比例配置在近代哲学的框架中被‘重建’。这样重建的哲学虽可徒有其表地保持其激进的、批判的外观,却不可避免地、命运般地经历着一系列的内部退却过程。”^②

由此可见,一场新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正呼之欲出。

第二节 生存论转向及其缺憾

“生存论转向”是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盛行于本世纪伊始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的理解和解释范式。也就是从这次转向开始,在哲学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悄然地被“马克思哲学”的概念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学界对此都心照不宣,但没有人专门就此作过理论上的分析和概念上的澄清,仿佛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其实,这一概念上的转换,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理论进步的必要环节,也就是通过超越“政治话语”的“学术话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层次的跃迁。何谓生存论转向?学者们从不同视阈进行了阐明。孙正聿教授在《“生存论转向”的哲学内涵》一文中认为,“生存论转向”包涵三重意蕴:第一,它“凸显了把哲学视为关于人类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这种哲学的自我理解”。第二,它“凸显了当代哲学的主题性转换,即凸显了当代哲学对人类自身的历史性存在的关切”。第三,它“凸显了当代哲学的价值取向,即凸显了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人‘本真性’存在的哲学诉求”。还有学者

① 贺来:《对辩证法三种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

② 吴晓明:《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2年第1期。